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亚当·斯密 关于法律、警察、岁入 及军备的演讲

〔英〕坎南 编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亚当·斯密
关于法律、警察、岁入
及军备的演讲

〔英〕坎南 编

陈福生 陈振骅 译



商務印書館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亚当·斯密
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
〔英〕坎南编
陈福生 陈振骅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81-7/F·138

196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204千
印数 5000册 印张 9 1/4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11.50元

亞当·斯密早期的經濟思想

——《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軍备的演讲》简介

亞当·斯密(1723—1790)是十八世紀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他的主要著作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出版)，在這一著作中，斯密表达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論證了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為經濟自由這個綱領性要求奠定了理論基礎，對經濟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許多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聯繫。馬克思說：“在亞当·斯密手中，政治經濟學發展到某種完整的地步，它包括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完備的輪廓。”^①

《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軍备的演讲》是斯密在格拉斯科大學擔任教授時的一部分講義，反映了他從事經濟研究開始時期的思想。1755—1764年期間，他在格拉斯科大學教授“道德哲學”，這門學科帶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它包括四部分：(一)神學，(二)倫理學，(三)法學，(四)政治學。第二部分關於倫理學的講義形成為一本獨立著作，即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論》。第四部分政治學講義包括我們現今稱為經濟政策和政治經濟學中的若干問題，這一部分可說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的胚胎。但是，全部講義原稿已在斯密逝世以前燒毀。現在出版的《关于法律、警察、

① 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2卷，參閱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4頁。

歲入及軍備的演講》，據英國經濟學家埃德溫·坎南考證的結果認為是斯密講義的第三、四兩部分的筆記。（參閱原編者引論）

斯密從事社會活動的時期，英國已經成為擁有世界頭等商業和龐大殖民地的強國。從十五世紀開始的農業革命，到了十八世紀六、七十年代已經完成。工場手工業獲得了廣泛的發展，它的基本特點——分工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英國國內市場的容量超過了歐洲其它國家，並不斷地擴大。在對外貿易額方面它也居於首位，出口物資的構成有了改變。但是，封建主義殘余仍然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小生產的比重還很大，商業資本控制著它們。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所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已不適合資本主義發展利益，英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壯大，不需要保護政策，力求實現完全的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地主貴族却利用他們在議會和政權機構中的地位，繼續根據重商主義原則制定有利於本階級利益的政策措施。

总的說來，當時英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間的矛盾。資產階級還起著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進步作用，它同無產階級的矛盾處在潛伏狀態。

《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筆記稿所記錄的斯密經濟思想的主題是論證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證明它能夠無限制地促進財富的增長，但它必須是在經濟自由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如同馬克思所指出：“古典派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他們代表著一個還在同封建社會的殘余進行鬥爭、力圖清洗經濟關係上的封建殘污、擴大生產力、使工商業具有新的規模的資產階級。……他們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下如何獲得財富，只是將這些

关系表述为范疇和規律并证明这些規律和范疇比封建社会的規律和范疇更便于进行財富的生产。”^①

这份演讲筆記稿表明，斯密特別強調分工，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富裕起因于分工，“在劳动沒有分工的野蛮国家，一切东西全是为了滿足人类的自然需要。但在国家已經开化，劳动已經分工以后，人們所分配的給养就更加丰富。”（本书第177頁）这是因为分工使得劳动的熟练程度提高，从做一种工作改为做另一种工作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减少，促成机器的发明，从而能够增加劳动生产物的数量。

按照斯密的說法，分工是交換的結果，“分工的直接根源乃是人类爱把东西互相交換的癖性。”（本书第184頁）“这个癖性的真正基础是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喜欢說服別人这种本质。”（本书第186頁）这种以人性論为基础倒因为果地把分工說成是交換的結果的观点，显然是錯誤的，其实交換却是分工的結果。不过，他正确地指出了分工的程度必須同商业的范围相适应，而商业的范围取决于人口密度和交通状况。

如上所述，斯密是資本主义工場手工业时期的資产阶级经济学家，工場手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分工，所以他頌揚分工，实际上是在頌揚工場手工业形式的資本主义生产。同时，他承认“在文明社会，虽然实行分工，但却沒有平等的分工，因为許多人沒有工作。財富的分配并不是依据工作的輕重。……負担社会最艰难劳动的人，所得的利益反最少。”（本书第179頁）

^① 馬克思：《哲学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頁。

此演讲作于工业革命前夜，在斯密思想中反映出当时大工业尚不发达，对自然的依赖性较大。他十分重视农业。他说：“在一切技艺中，对社会最有利的是农业。什么东西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什么东西就对公共利益有极大的危害。农业的产量比任何产业的产量都大。”（本书第233页）这种说法有着一定的合理的地方。

他指责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阻碍农业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农奴和奴隶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力量去改善生产。他还指出，“一个国家制造业愈多，农业就可能有愈大的发展，所以凡妨碍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同时也就是妨碍农业发展的因素。”（本书第239页）他断言，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发生财富大量的积累；只是到了封建政体崩溃之后，阻碍勤劳的因素消失了，财富的积贮才逐渐地增加起来。

在斯密的演讲中，有不少地方对重商主义作了批判，并且认为休谟、洛克虽然也指摘过它，但不够彻底。他指出重商主义者把财富看为是货币是荒谬的，货币乃是流通工具。“正如一个地区的价值不在于通过该地区的公路的多少，一个国家的富裕不在于用以实现货物流通的货币的数量，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本书第204页）他进一步批判地分析了基于重商主义原则而在实践方面引起的许多做法和说法，认为政府禁止铸币出口、贸易差额论以及约翰·劳的计划等等都是危害性很大的错误措施和见解。

斯密强调必须实行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认为“法律和政府似乎也只有这个目的：它们保护那些积了巨资的人，使他们能够平安地享受劳动的果实。”（本书第176页）。他反对利用法律或章程把物品价格抬高到自然价格以上，或压低到自然

價格以下，因為這兩種做法都會妨礙財富的增長。他說，各種壟斷事業和專利公司過去雖曾促進國家的利益，但就現今來說却是不利的，這些壟斷和專利的結果提高了物品的價格。對貨物課稅也有同樣的結果。反之，對某些物品給以津貼，以便宜的價格在市場上出售，固然能使它們易于賣掉，而且產量也會增加，但卻破壞了生產的自然平衡。由此，他得出結論：“总的說來，最好的政策，還是聽任事業自然發展，既不給予津貼，也不對貨物課稅。”（本書第196頁）

國內的經濟政策原則是如此，在國際經濟關係方面也應該這樣。斯密依據對分工作用的見解來論證這一點。他指出，兩千萬人 在一個大社會里通力合作所能生產的貨物，會比僅僅擁有二三 百萬人口的社會所能生產的貨物多一千倍。因此，愈是實行自由 貿易好处愈大；並且，對於一個富裕的國家說來，和貧窮的國家通 商所得到的好處將更大。斯密寫道：“似乎必須把不列顛宣布為自 由港，並對國際貿易不加任何阻礙。如果可能使用其他方法支付 政府的費用，應該停征一切的稅，关税、消費稅等。應該准許和一 切國家通商與進行交易的自由，應該准許和一切國家買賣任何東 西。”（第220頁）

斯密在論證資本主義優越性時候，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內部 聯繫作了初步的探索，闡述了一些政治經濟學原理。

他區分了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指出這兩種價格從表面上看 來似乎沒有相互的關係，其實却是息息相關的。每一種貨物都 有這兩種價格。他認為市場價格可能高於或低於自然價格，從而調 节物品的生產和流通。

不過，斯密所說的自然價格是指勞動的自然價格，即工資。在他的觀念里，這種工資還包括利潤。所以他說：“如果一個人所得的收入，足以維持他在勞動時期的生活，足以支付他的教育費，足以補償不能長命和營業失敗的風險，那末，他就得到了勞動的自然價格。如果人們能獲得勞動的自然價格，他們就得了足夠的鼓勵，而商品的生產就能和需求相稱。”（本書第191頁）同時，斯密還具有物品數量的多少決定它的價值的思想。他寫道：“水所以那麼便宜，就是因為它可以取之不盡，而鑽石所以那麼昂貴，是因為它希罕難得”（本書第174頁）。

斯密對商品價值的見解雖然是糾纏不清，但可以看出其中有着用勞動來決定商品價值的思想萌芽。

在說明物品的價格是如何決定的問題以後，斯密緊接着分析貨幣。他正確地認為貨幣是價值的尺度和交換的媒介，指出有許多物品都曾經作為貨幣，金銀之所以成為貨幣是由於它們的自然屬性比較合適。他还劃分了價值尺度和價格尺度，不過不叫這樣的名稱，而稱為價值的自然標準和數量的自然標準。“由於金銀成為價值的尺度，它也就成了交易的工具。”（本書第198頁）

“但應該注意，貨幣並不是價值的真正尺度，價值的真正尺度乃是勞動。”（本書第203頁）這裏斯密接近於區別價值的內在尺度（勞動）和外在尺度（貨幣），同時表明他已有用勞動來測量價值的思想因素。

在演講筆記稿中，沒有對資本作專門的考察，只是在說明富裕所以不能迅速增長的原因時提到資本。他把資本同財貨混為一談。他沒有看到資本並不是物，而是生產關係，是被物所掩蓋着的資本

剥削劳动的关系，因而认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财货，把储存品的形成看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现象。

斯密特别讲到利息，但没有分析利润和地租。他指出，利息率取决于能够贷出的财货的数量和需要借入财货的情况；随着社会发展，财货大量积累，利息率逐渐下降。我们知道，利息率的水平是由借贷资本的供求量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率有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利润率有下降趋势和借贷资本量的不断增大。

综上所述，斯密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抓住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和要求。当然，这时斯密的经济思想还不成熟，许多政治经济学原理还不明确，甚至没有考察。但是，斯密研究经济问题的总方向，他的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已经奠定了，并对价值、货币、资本、利息等政治经济学范畴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所有这一切在他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本书反映了亚当·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它的翻译出版不仅有助于我们开展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且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林森木

1962年9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BAB22/2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Delivered by

Adam Smith

Reported by a Student in 1763

Edited by *Edwin Cannan*

(根据纽约 Kelley & Millman 公司 1956 年版译出)

目 录

| | |
|------------------|-----|
| 原編者前言..... | 2 |
| 原編者引論..... | 3 |
| 法律学..... | 29 |
| 第一篇 論法律..... | 32 |
| 第一分部 論公法..... | 35 |
| 第二分部 家屬关系法 | 94 |
| 第三分部 私法..... | 126 |
| 第二篇 論警察..... | 172 |
| 第一分部 清洁与治安 | 172 |
| 第二分部 价廉与物博 | 174 |
| 第三篇 論岁入..... | 245 |
| 第二篇 論警察(續)..... | 260 |
| 第四篇 論軍备..... | 266 |
| 第五篇 論国际法..... | 270 |
| 譯名对照表..... | 384 |

原編者前言

关于現在刊行的这部演讲筆記的来历以及我在編校时所采用的原則，都已經在《引論》中詳細地叙述过了。

在这里，我只要对托馬斯·罗利先生表示我的謝忱。在我着手這項工作的时候，罗先生是牛津大学英格兰法讲师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委員。現在，他是樞密院法律委員会的干事。除仔細閱讀全稿并对那些他认为有訛誤的或需要解釋的段节提出意見外，他并且不倦地随时答复我所請教的关于法律方面的問題。其中有許多問題，除了一个认真对待編校工作的編輯人以外，在任何人看来一定是无关重要的。但有一点必須明白，由于他沒有机会知道我如何利用了他的意見，他对我所作的注釋不负什么責任，正如霍金斯先生和其他我曾請教过的法律权威一样。

埃德溫·坎南

1896年8月于牛津

原編者引論

第一章 演讲筆記的来历

杜格耳德·斯图尔德在他所著的《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中說，“亚当·斯密先生在格拉斯科大学任教时的讲稿，除他自己在《道德情感論》和《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发表的那部分外，其余已全部佚失了”。斯图尔德是于1793年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宣讀上述論文的。这篇論文經他的許可刊載于該学会那年的会刊上，^①后来于1795年^②和1811年^③重印了两次。一百多年来，无人对該論文所說的話提出质疑。就亚当·斯密自写的讲稿說，斯图尔德上述的話无疑是對的。

亚当·斯密曾委托休謨作他的遺著管理人。他在1773年4月間动身去倫敦以前，曾写信給休謨，告訴他万一他死了应如何处理他的遺稿。信中說，除他随身所帶的那部分稿件（即《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稿）以外，其余全不值得发表，但放在某張书桌里的天体史未完稿，也許可以付印，作为“一本計劃中要写的少年讀物”的一部分。这封信接下去說，“所有散在該书桌里面或在臥室中玻璃折門衣櫈里面的稿件，以及約十八本薄薄的对开頁

① 第3卷第1篇第61頁。

② 《故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哲学論文，卷首載有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員斯图尔德所著“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第15頁。

③ 《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宣讀的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神学博士威廉·罗伯逊和神学博士托馬斯·里德的傳記的合訂本，附有注釋》，第12頁。

的稿件，可不必檢查，付諸一炬”。十四年后，当他又想去倫敦时，他又“囑咐他委托处理其著作的朋友說，他死后务必将他的全部讲稿焚毀，至于其他稿件，可由他們自由处理”。1790年10月，在他死前十日或二星期，“他又跟他的朋友們談到这問題。他們請他安心，說必定照他的意思處理。他听罢十分高兴。但过了几天之后，他觉得还有些不放心，就請求这些朋友之一立即把他的讲稿燒掉，这事就在当时办竣。他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竟然能够像平素那样談笑風生地接待他的朋友”，不过他已不能像平日那样陪他們坐到深夜，他未吃晚飯即上床就寢，他向朋友們告辭时說：“我相信我們一定会在別的地方繼續举行这种集会。”^①

以上故事是詹姆斯·赫頓所述的。他是受亞當·斯密委托处理他的稿件的朋友之一，另外一个是約瑟夫·布萊克博士。^②看到赫頓博士謹慎地使用了“这些朋友之一”这样一个措辞和“这事就在当时办竣”这样一个无人称句，多数讀者会推想赫頓本人就是焚稿人。但那天晚上麥肯齊也在吃晚餐，據說他告訴塞繆爾·羅杰斯說，焚稿人是布萊克。^③凡曾企图把几百張对开頁的稿子焚毀的人，沒有一个会对在这样虛弱情况下的亞當·斯密不亲手做这件工作感到惊奇，尽管他已經坐起来，且在那个七月的早晨房中还生着火。从上述的故事以及他寫給休謨的信可以看出，那天早上朋友來到的时候，斯密還高臥在床上，而那些“薄薄的对开頁的稿子”，

^① 斯圖爾德的論文，見《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刊》，第3卷，第1篇第131頁；《亞當·斯密的哲學論文》，第88頁；《傳記合訂本》，第109頁注釋。

^② 見《亞當·斯密的哲學論文》，第34頁和邦訥：《亞當·斯密圖書館目錄》第16、17頁所載亞當·斯密的遺嘱。

^③ 克萊登：《羅杰斯的早年生活》，第161頁。

正像十七年前在克卡耳迪一样，还放在他臥室里的“玻璃折門衣櫥中”，他虽然能看得到，但由于他病重（晚上才舒服一些）却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斯密請他的朋友把讲稿从衣櫥中拿出来焚毀，是最自然的事了，不管讲稿是在臥室中当他的面焚毀还是在别的地方焚毀。

讲稿既已这样毀掉，关于亚当·斯密的演讲，九十年来，人們不得不滿足于斯图尔德从約翰·米勒那里取得的記述。米勒似曾亲自听过斯密的全部或大部分的演讲：^①

“亚当·斯密剛到格拉斯科大学时，任邏輯学教授。在此职时，他很快就觉得有必要大大地改变前任的教学計劃，并使学生的注意力，从一般学校所开的邏輯学和形而上学移轉到更有趣的和更有用的科学的研究上面。于是，在概述了精神力量并讲解了一些古代邏輯学来滿足学生对矯揉造作的推論方法的好奇心以后（这个推論方法在某一时期中曾得到学者的普遍注意），他用全部其余的时间致力于讲述修辞学和文学……”

“任邏輯学教授約一年后，亚当·斯密被任为倫理哲学教授。这門課程的讲授，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讲神学，論述神的存在的证据和神的各种属性以及宗教所根据的人的精神的各种原則。第二部分包括所謂狭义的倫理学，这主要是由后来他在《道德情感論》中发表的各种學說組成的。在第三部分中，他更詳細地討論了与法律有关的那一部門的倫理学。这部門的倫理能够容易地定出精細而准确的原則，所以也能够加以全面的、詳細的叙述。

^① 参閱他所著《从历史上来考察英国的政治》，第 528 頁和雷所著《亚当·斯密的生平》，第 43 頁和 53 頁。